

走过冬天的中国体育——伦敦奥运后中国体育发展问题引论

陆小聪（上海大学，中国上海）



作者简介：陆小聪，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体育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日本东京理科大学访问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学者。

近年来主要围绕体育场域论、市民团体发展和城市空间的社会型塑等主题展开相关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论体育的仪式意义及其社会认同功能”（2008年中国社会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休闲与生活世界重建”（第九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体育社会学研究视域的构筑”（第十一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体育实践空间的社会学研究”等。

Sports in China that has left Winter Behind ——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fter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

关键词：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Key words: London Olympic Games; China; sports; development

伦敦奥运会已然落下了帷幕，在现代体育的主要发源地，中国奥运军团取得了史上域外参赛的最好战绩。在这世界体育大战偃旗息鼓之后，留给国人的却有太多值得思考和辨析的问题。

曾几何时，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经历了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以夷制夷”，其实都凝结了一个共同的期待：让岌岌可危的民族尊严屹立不倒！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再度辉煌！对于当时处在“丧权辱国”不平等局面的中国社会而言，奥运会具有一种特别的象征性意义，它意味着加入到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参加奥运会彰显着一种平等的、有尊严的国际地位的获得，而在奥运会这一国际舞台上的胜利，则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力量和雄心。

二战结束不久，一道铁幕不仅在欧洲落下，而且迅即笼罩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东西方的冷战格局，奥运会因此蜕变成这两大阵营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代理战争”。体育竞技的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奥运会的胜利则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凭据。

1952年，“国家体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这一场既关乎民族荣誉，又体现制度优势的奥运之战。在继续推进“国民体育”政策的同时，我国开始侧重构筑旨在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制度体系，迅速形成了作为其制度保障的“三级训练网”。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体育发展的基本国策，确定了省市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省市以下体委则“侧重抓群众体育的普及”的政策分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立的“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战略方针，则奠定了此后中国在体育发展上的基本走向。

毋庸置疑，被誉为“举国体制”的中国竞技体育，就其制度目标的达成而言，迄今为止它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起，中国奥运军团开始名列三甲，北京奥运会更是独占鳌头，即使在刚刚谢幕的伦敦奥运会上，也紧随美国之后，毫无悬念地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辉煌战绩。中国体育健儿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曾经感动并激励了无数的国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男排身处逆境对战韩国男排，顽强拼搏最终反败为胜的壮举，让刚进入改革

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为之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北大学子因此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体育的社会凝聚功能在那特殊的年代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竞技体育成功的背后，有着无数体育人的默默付出，在披荆斩棘的征途上，有着诸多的艰辛与磨难。竞技体育的所谓“举国体制”，顾名思义就是集中全国体育之力，以推进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这一体制的运转基础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对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政策性倾斜，因此，它是以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缺失作为其制度代价的；这一体制的组织基础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训练和竞赛体系，在这体系之外的个人或团体，几无可能在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舞台上一展身手，而使国民公平参与体育竞技的权利大打折扣；这一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竞技舞台上技压群雄，勇冠三军，从而给国民带来扬眉吐气的一刻。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夙愿，无数体育人在集体的目标面前让渡出作为个体的权益，而被配置在金牌制造链的相应环节，多数人成为竞技体育登峰路上的阶梯。

1908年刊登在《天津青年》上的一篇文章，在当时曾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该文向国人提出了3个问题，即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今天，恐怕再也没有人这样来提问题了。一百年过去了，中华民族振兴的篇章早已翻过新的一页，中国的体育健儿也屡屡披金戴银，凯歌高奏，基本确立了在奥运竞技舞台上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消解了一百年之前承载在“奥运问题”上的历史意义，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已经不会因为多得了一块金牌而欣喜若狂，也不再为输掉一场比赛即愁眉不展。中国体育以一种悲壮的行色开启的征程，终于走过了负荷沉重的冬天，迎来了“胜则固喜、败亦欣然”之足以从容的季节。

这种从容还体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卸下曾经承载在体育身上的过于沉重的各种附加性功能意义；再一次审视中国体育发展所经历的坎坷曲折，反思这其中的得失成



败；进而在根本上重新去思考体育对于人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本来意义，重新去构建未来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国民需求的体育发展之路。

正是基于如此的思考，上海大学在伦敦奥运会闭幕不久，即举办了题为“伦敦奥运后中国体育的走向”的学术论坛，并与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组织了本期的专题研究，聊以欣慰的是，这一倡议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

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前司长谢琼桓先生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视野”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在此前引起极大学术影响的“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并运用历史辩证的方法，提示人们不仅需要历史的眼光去评价过去，而且更应该从容地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今天，规划未来的体育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在题为“发展三大球，促进体育体制改革”的专稿中，首先全面评述了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的种种典型现象，随后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发展足篮排三大球，以突破在现行体育制度下的发展瓶颈，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从而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社会自发萌动的自下而上的力量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仇军教授在论坛发言的基础上，形成了“伦敦奥运会后中国体育走向何方？”的文章。该文基于国际体育比较的视角，同时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通过对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属性、功能和发展特征的分析论证，得到了“强政府发展竞技体育、强社会发展大众体育”的基本结论。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顾骏教授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以社会学家所特有的思考方式，辨析了在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国家和国民”、“国家和运动员”、“中国与世界”等三大关系，并对镶嵌于其中深刻的社会意蕴做出了解读。全文词锋锐利、观点鲜明，足以发人深省。

成都体育学院卢锋教授的“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猜想”，就其内容而言，绝非是一种凭空猜测，而是基于科学的实证方法，对奥运会举办国体育发展的后续效应以及我国体育运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趋向等问题，进行了论之有据、持之有理的分析和讨论。

上海体育学院徐本立教授在“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若干问题”论文中，则根据他自身多年来对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研究心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逐步向以社会化为主的混合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过渡”、“通过购买服务淡化国家职能，加大社会职能”等主要研究观点。

综观上述研究，虽然存在研究视角上及其在问题意识本身等方面的差异，但就各自的研究立场而言，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体育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变革创新的有利时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也应该从容地用一种崭新的思维去运筹帷幄，开辟未来更为健全的体育发展之路。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视野

谢琼桓（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北京）



作者简介：谢琼桓，1994年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在原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先后出任理论处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学会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兼任中国体育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协会五届全委会委员。出版《五环夜话》、《守望体坛》两书。主持或参与近20年来国家体育总局重要文件的起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体育改革及发展纲要》。发表评论和论文几十篇。主持国家社科课题《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New Viewpoi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关键词：伦敦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发展 Key words: London Olympic Games; China;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

就竞技体育而言，伦敦奥运会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体坛的前列地位，我们已经强大到能够承受为了今后体育更加全面、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进行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强大到能够经受奥运成绩在第一集团内升降起落。

今后面对奥运会，我们不应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相反，我们会从容淡定，不亢不卑，放松自如参与各种活动。总之一句话，我们会处之泰然。偶尔也可来点我行我素。当然，我们不要傲慢，更不要将赛场上的胜负作不必要的引申。我们会渐渐学会在“压力”“残酷”“雪耻”“报一箭之仇”的赛场语汇中，找到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